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主张“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中学，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上述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中等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最近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的有关文件也明确提出：“中等教育是基础教育，它应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为社会培养优良的后备力量”。

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为国家造就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和技术水平的高级人才。这就要求中学一方面向高等学校输送合格的高质量的新生，另一方面，要输送极大部分中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因此，如果在中学阶段没有必要的劳动教育与生产技术训练，中学生一旦走向社会时就会感到束手无策，就业无门。这种教育不仅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现在我们采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的办法，在有关教育计划中规定在城市里40%的初中生升入普通高中，60%的初中生升入职业技术学校。但是即使分流以后，在普通中学里还要加强劳动教育与生产技术的训练，因为不是40%的普通高中毕业生都能升入高等学校，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还是要直接就业的。另一方面，在职业技术学校里还有个提高普通文化知识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素质。我们不能走历史上许多国家解决高中阶段双重任务分而治之的道路，也就是不给普通高中的学生任何劳动和职业技术训练，而对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只作较低的一般文化知识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作法从两个极端都显示出弊病。一方面，未能升入高等学校的普通高中毕业生由于缺乏必要准备而在就业上遇到挫折，另一方面，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由于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技能过窄过细而产生适用期短的现象，特别是一般文化知识基础薄弱往往成为他们在职转换和继续深造时的障碍。由此看来，我们要完成中学教育的双重任务，也只能走“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的路子。而要实现这“两化”，中等教育必须切实加强劳动教育。

当然，要加强中学的劳动教育，不仅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而且还得回顾和总结几十多年来在劳动教育上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新时期的特点，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中等的劳动教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试论保皇会的性质

王思远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于1899年7月在加拿大与华侨、商人共同创立了“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并陆续在美国、澳洲、南洋等地建立组织，设总部于澳门，宣传君主立宪，许多海外华侨纷纷入会并捐集资金。1907年元旦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保皇会一共存在了七八年的时间。

关于保皇会的性质，史学界有三种看法：（1）反动团体；（2）改良组织；（3）华侨群众爱国团体。笔者认为保皇会的性质应分阶段来具体分析。它的前期（1899—1905），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团结中国近代华侨的爱国群众团体。它的后期也不应定为反动的组织。保皇会在后期是因为已丧失了其历史任务而趋于解体的。

保皇会亦称为中国维新会，从这个定名中就可以看出，保皇会在保皇的同时，是企图继续在中国推行维新改革。它的实质是想变中国的封建政体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

1899年康有为说过：“诚以四万万臣民之命，悬于圣主之手，圣主安全则四万万民之安全，圣主不安则四万万臣民皆不安全。”《保皇会草略章程》中也以“本会专以保全中国为主。盖中国危弱，欲保身家非保国不可，欲保中国非保皇上复位不可”，为宗旨。从中可以看出康有为有非保住光绪帝的位置无以维新救中国的思想。

保皇会以保皇形式出现，使得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为那时海外华侨绝大多数人是把皇帝看成国家代表的。当康有为发出：“保皇会，则保己能医救我国民之圣主复位，则四万万入立救矣”的号召时，使保皇会赢得了爱国心切的广大华侨的拥护。把维新变法与光绪帝看成中国新希望是他们的共识，海外一百多万爱国华侨“怀忠君爱国之心，创保皇会以救圣主而救中国，各埠莫不踊跃争先举行”，“欧美旅民奔走来归，入会者数百万人，开会者凡数十埠地”。保皇会共建有海外总会11个，支会103个，这种人心倾向不可一概认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进行欺骗宣传的结果。保皇会认为要忠君、爱国、救种，这揭示了保皇会的以保皇形式继续进行维新变革的进步性质。

康有为曾声称，保皇会是专门反对后党的。它们之间矛盾的焦点在于变政上，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完全控制了清政府，这股顽固守旧的封建势力代表着反动的专制统治。保皇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也就成了一个反封建专制的团体。认为中国在他们的专制统治下，那么“二万里之中国必亡，四万万之人民必绝”。维新派所推崇的是一个“君者为民办事者也，一国之公仆也”。“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君有君权，民有民权，各不相侵”的社会，认为国家是属于民众，即资产阶级的，不是朝廷之物，更不是个人的私产。

本着这种反守旧专制的思想，和坚信“新旧交争，无不新胜而旧败者”的观念，以及“为国者，不尽锄其旧积，则新政难成”的思想。就必然导致以实际行动支持一个“深知外国法律风俗之美，欲仿而变之”的光绪帝。主张保“维新”的皇帝，学习西方政治体制，是当时先进中国人的所思所行，这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和爱国的。因此不能笼统地把保皇当作“封建余孽”的同义词。只要是限制封建专制主义的，即便是立宪运动也有它历史的进步性。

同时从康有为的论著中，又可以发现，他也没有从人类社会历史进步中把共和制一概抹杀。在1902年至1903年撰著的《大同书》中，康有为综合维新思想、进化论观点和今文经学“变易”的哲学观点，再一次阐述了他的公羊三世说，从“据乱进”进入“升平世”，将来实现“太平世”、即“大同世界”。这是一条由君主专制进入君主立宪，将来再实现民主共和的循序渐进行程。康有为没有否定共和政体，只不过认为此时中国民智未开，还不具备马上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

1900年自立军的自立勤王起义，是保皇会企图武力推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巨大行动。自立会的“自立”思想表明：予人民以立宪自由的政治权利，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废除清政府的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府。从中也可以反映出保皇会的反封建专制的进步性。

当革命派势力小于保皇会时，当社会舆论多数仍是倾慕君主立宪政体时，当革命派的主张远没有维新派主张被中国人所能接受时，保皇会对团结广大海外爱国华侨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05年8月20日，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此后革命的思潮逐步占据了社会舆论和民众的思想。保皇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并且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随心所欲地把一个历史上最大的华侨组织说成是反动团体，显然打击面太宽了，是不能成立的。